导 言

中国与俄罗斯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早在沙皇俄国时代即已开始，苏联时代更扩大到原苏联辖的辽阔地区。本书所述重点虽然是与俄罗斯的交往，但从时间上算，实际上包括从俄罗斯时代到苏联时代，再到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时代；从地域看，则包含苏联时代的广大地区。故称之为《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

俄罗斯和苏联地区文化历史概貌

公元六世纪时，分布在欧洲东部的斯拉夫族，是欧洲最大的部族之一。后来,这个部族逐渐分成东、西、南三支 其中居住在西起德涅斯特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东至伏尔加河流域、南抵黑海北岸、北达拉多加湖的广大地域的一支，即东斯拉夫人，就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祖先。

东斯拉夫人于九世纪在基辅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基辅罗斯。基辅罗斯属于早期的封建国家，绝大多数居民，即农民（古称斯默德),受封建主的剥削和奴役。政治文化生活的中心则在于城市,城里住的是王公贵族、商人和市民。从此时开始有了俄罗斯的古代文化。

俄罗斯古代文化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是基辅罗斯时期（九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十二世纪），第二是蒙古人入侵和东北罗斯统一时期（十二至十五世纪），第三是莫斯科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时期（十六至十七世纪）。

基辅罗斯从九世纪起就有了文字，系以希腊斯拉夫人基里尔和麦霍迪亚所创的斯拉夫字母为基础而形成的。公元 863 年，拜占廷帝国派遣出生于希腊的基督教传教士康斯坦丁·基里尔和麦霍迪亚两兄弟去摩拉维亚传教，他们以希腊的多角字体为基础，增添斯拉夫语的发音符号，几经修改，逐渐形成了斯拉夫文字。这种文字后来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所用。不过各国在使用过程中又各自几经变动，形成了彼此有差别的各自国家的文字。

对基辅罗斯文化影响最大的事，是公元 988 年由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的决定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在此之前，罗斯是个多神教的国家 。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通称耶稣教)三大教派。1054 年基督教开始分裂为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派和拉丁语地区的西派。西派以罗马教会为中心，故称罗马公教会，通称天主教会。东派以君士坦丁堡教会为中心，自称信奉正统教义，故称东方正教会，简称东正教会。俄国所接受和信奉的是东正教。东正教作为国教，起了促进罗斯统一的作用。

最初，东正教从拜占廷(东罗马帝国)经保加利亚传入罗斯，很快就在罗斯全境传播开来。随着在全国的传播，大批拜占廷神甫也带来了拜占廷的教堂建筑和圣像艺术，宗教文学、史地学，以及神学观念和思想。这促进了基辅罗斯和拜占廷、保加利亚的文化交流，也使基辅罗斯的文化带有深刻的基督教文化的传统。

基辅罗斯时期宗教文化盛行，同时也有一些世俗性的著作。该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俄罗斯编年史》(十二世纪初)和《伊戈尔远

征记》(约 1187年)。前者为基辅山洞修道院僧侣涅斯托尔所撰,既有接近于历史事实的记载，又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但也体现了古代罗斯人的世界观和民族意识。后者的作者已不可考，记叙的是 1185 年罗斯大公伊戈尔一次失败的远征，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高度艺术性，是古代罗斯文学的一颗明珠。

十三世纪蒙古人开始入侵，1240—1480 年罗斯处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后来,以原来基辅东北的苏兹达尔、罗斯托夫、莫斯科、特维尔等城市为另一个中心，逐步形成东北罗斯，在蒙古人撤走之后发展为俄罗斯。而西南罗斯和西部罗斯则归并于立陶宛，后来分别成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当年的罗斯，在蒙古大军所到之处，经济和文化遭到严重破坏。这使罗斯的发展停滞下来，大大落后于西欧。另一方面，蒙古的征服和统治也给罗斯的军事、政治制度，甚至土地和税收制度以深刻的影响。后来，莫斯科大公在争取罗斯独立的斗争中就曾依照蒙古的方式来重建其军事政治制度。所以在十四至十六世纪建立的俄罗斯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就打上了蒙古方式的烙印。

十六世纪初，以莫斯科为中心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国家。伊凡四世为了把全国统一在君权和神权思想之下，出版了一批宗教书籍,如《正教历》、《家训》等,目的在于使社会生活、家庭伦理有所遵循,达到规范化。《家训》的主旨就在于把家庭、国家、教会结合在君主专制的原则下，宣扬上帝是天国的主宰，沙皇是人间的上帝，父亲是家庭的权威。伊凡四世在强化国家专制政权中宣告成为俄罗斯的第一个沙皇。

由于沙皇俄国四处征战，在十六世纪中叶征服了中亚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国，十七世纪几乎征服了整个西伯利亚，十七世纪下半叶又吞并了乌克兰，这使俄国成为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

沙皇专制制度的加强导致了国家封闭性的加剧；但在同立沃尼

亚的征战中，沙皇俄国又逐渐认识到自己在经济、军事上同西方的差距，于是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整个十七世纪就在这两种倾向的矛盾中度过。

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俄罗斯文化也开始恢复了生机，教育、科学技术、艺术有了较全面的开展，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宗教束缚，出现了现实主义的小说。乌克兰文化在沙皇制度的压迫下，其发展既受到阻碍，又受到影响和促进。白俄罗斯文化则由于天主教的传入，教会开办学校的影响，在十七世纪也仍带有宗教色彩。

十八世纪是俄罗斯文化向近代文化过渡的准备阶段。其标志是彼得一世的改革，使国家迅速地巩固和富强起来，走向近代俄罗斯民族国家，开始了新的历史阶段：俄罗斯帝国的建立和鼎盛时期。

彼得一世在位期间(1682－1725 年）先发动俄土战争夺得亚速，建立新海军基地塔干冈格；继又以二十一年的持续战争打败瑞典，夺取涅瓦河口、里加湾的波罗的海诸海口，打开了俄国通向欧洲的门户。他对内则改革政府机构,加强中央集权,发展工商业,为大力提高俄国文化而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使俄国迅速摆脱中世纪的愚昧落后状态。这为俄罗斯近代民族文化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但是彼得一世的改革是以“全盘西化”为方针的，因而有其消极面，即在贵族和上层人士中养成盲目崇拜西欧文明，轻视本民族文化的风气。而这一点恰恰遭到下层人民的抵制。同时，彼得一世改革的目的是巩固沙皇俄国的专制制度，而又是以农奴制为基础。这同所引进的西欧启蒙思想（实际是资本主义文明）也是相矛盾的。因而整个十八世纪俄国是在这种种矛盾中为探索民族发展的新路而努力。这使其文化也具有过渡的性质，即借鉴西欧，逐步具有自己的面目。

其特征之一，是引进启蒙思想。十八世纪初的向西方开放就已经为启蒙文化的传入创造了条件。到了中叶，俄国更是大批翻译出版西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马布里等人的著作，

启蒙思潮滚滚而来。无神论的思想和批判宗教黑暗势力的精神，“天赋人权”的思想和争取政治自由、公民平等的主张，“知识就是力量”的思想和科学应脱离神学而为人类造福的信条等等，有力地启迪着俄国思想界，造就了一代俄国自己的启蒙学者，如冯维津、诺维科夫、拉吉舍夫等。

启蒙思想的浪潮冲击俄国，甚至导致了“开明专制”。十八世纪中叶在位的彼得一世女儿伊丽莎白女皇和以后在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先后都宣布实行“开明专制”。她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接受某些自由主义的原则，但却不愿意削弱专制的权力，反而想借助于前者来加强专制，因而被后人斥为“伪善”。但她们的姿态却有利于启蒙思想的传播。

其特征之二，是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仿效西欧开展了文化教育，探索本民族的文学艺术发展途径。创办各种类型的学校、加速培养人才，尤其是 1755 年创立了莫斯科大学，使之成为俄国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中心。此前并已于 1724 年仿照西欧模式建立了彼得堡科学院。由此也产生了一批受过西欧思想和科学知识滋养的俄国学者，如罗蒙诺索夫(1711－1765 年)等。

文学艺术的发展主要也是借鉴西欧的经验，西欧曾经流行过的文艺思潮和流派都被移植过来。俄国几乎是依次借用了西欧的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艺术方法，用了十八世纪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走完西欧十七世纪以来二三百年文艺思潮的历程，直至十九世纪初才找到为发展本民族文学的有效方法——批判现实主义。因而十八世纪的俄国文艺整个是模仿西欧文艺的过程，尚未摆脱西方艺术的痕迹。不过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作家，如康捷米尔、苏马罗科夫、卡拉姆辛、杰尔查文、拉吉舍夫、克雷洛夫等。

沙皇俄国在十八世纪强盛之后，已能立足欧洲，并开始争夺霸权，继十七世纪下半叶吞并东部乌克兰之后，十八世纪下半叶俄国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三次参加瓜分波兰(1772、1793、1795 年),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都划归其版图。乌克兰、白俄罗斯从十八世纪开始，文化的发展都受到俄罗斯的影响。

十九世纪是俄罗斯文化繁荣的世纪。俄国专制农奴制发展到十九世纪初，危机已充分显露。几代的有识之士都在为探寻俄国的发展道路而努力。在十九世纪先后出现了贵族革命家、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所领导的三次解放运动，其目标都要废除专制农奴制。社会运动和思潮的活跃促进了文化思潮和流派的蓬勃发展，俄罗斯近代文化经过了十八世纪的酝酿和准备，就在十九世纪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文化的发展一般要比社会经济滞后。如果说十八世纪是俄罗斯帝国的鼎盛时期，那么十九世纪就是俄罗斯文化的空前繁荣时期。

繁荣的景象之一是新思潮层出不穷，而且迅速更迭，引起俄国思想界空前活跃。这些思潮大多是从西方引进，但其做法与十八世纪不同，不再是照搬或单纯模仿，而是力求使其俄国化。

1825 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就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冲击俄国的结果。但当时的俄国不存在资产阶级，因而一部分先进贵族便起而接受，把它作为反对封建专制农奴制的武器，开展了十二月党人运动。他们的政纲不尽相同，但无论主张共和，还是君主立宪，都是受到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启迪，不过已经被俄国化了，变成了贵族自由主义。后来贵族自由主义思潮在思想界有过很大影响。

同样,1861 年开始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其思潮也是来源于西欧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但从俄国解放农奴的实际需要出发，发展到主张暴力革命、用武力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于是便演变成五六十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这样强有力的革命思潮。不仅如此，七十年代的民粹主义革命思潮也与此有关，都是为了解放农奴这个社会大问题。

这一派的思想家，无论是赫尔岑、别林斯基，还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都设想过俄国依靠农民的力量，就可以由俄国农村传统的“农民村社”（Община）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因而他们把西欧空想社会主义与俄国村社相结合，变成俄国的农民社会主义。这种思潮对文化界也有重大的影响。

至于 1895 年由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开始的无产阶级运动，也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后，由列宁根据本国国情加以具体化，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分两步走，先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实现民主革命，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思潮无疑具有更大的号召力，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叶，并由此产生了列宁主义。

当然，引起思想界剧烈争论和极为活跃的还有不容忽视的两派——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这两派从三十年代形成起就长期论争，互相对立，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彼得一世的改革。两派论争的中心是俄罗斯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前者认为应该凭借俄国固有社会结构和民族性，把民族精神加以发扬光大；后者主张必须向西欧学习，只有“西方化”才是出路。这两派的争论长久而剧烈，影响也大，每逢俄国到了历史转折时期必然一再出现，甚至延续至今。

繁荣的景象之二是教育的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全面进步。国民教育的开展已形成体系，设立了古典中学和实科中学，新创立哈尔科夫大学、喀山大学、彼得堡大学、基辅大学等一系列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和科研工作的开展，六十年代起，自然科学呈现繁荣局面，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各部门出现了诸如洛巴切夫斯基、波波夫、门捷列夫、季米里亚捷夫、巴甫洛夫、米丘林等一批大科学家。社会科学在历史、哲学、经济和政治学上都有突出的进展，出版了俄国历来最有分量的著作。卡拉姆津、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索洛维约夫、克留切夫斯基、普列汉诺夫等成了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代表人物，列宁则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上作出创新和贡献。

繁荣的景象之三是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人才辈出，灿若群星。他们提供了第一流的作品，创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

别林斯基曾经说过，在普希金以前，俄国没有文学。这是指没有独具民族特色而言。十九世纪从普希金起的文学则以批判现实主义为标志开始了具有民族独特性的俄罗斯文学，出现了一系列驰名世界的作家 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罗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谢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他们使俄罗斯一跃而成为世界文学大国。十九世纪的俄罗斯为世界留下了一批光彩夺目的文学名著。

建筑、雕塑艺术和绘画有了全面的进展。产生了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谢罗夫等大画家,对风俗画、肖像画、风景画、历史画和舞台装饰画都作了开拓，表现了现实主义的强有力的风格。

音乐上十九世纪初叶有格林卡对俄罗斯的音乐艺术作了创新，而六七十年代的“强力集团”更是追求现实主义艺术，对民族音乐作了突出贡献。这个时期也产生了闻名世界的音乐家里姆斯基一柯尔萨科夫、穆索尔斯基、柴可夫斯基。

此外，戏剧和芭蕾舞也有长足的进展。

随着沙皇俄国在十九世纪先后征服了高加索和中亚各汗国，俄罗斯文化也开始对这些地区发生影响。

十九世纪的乌克兰文学和白俄罗斯文学，也在批判现实主义的潮流中有过重大进展。乌克兰出现了谢甫琴科、弗兰科、乌克兰英卡等，白俄罗斯出现了鲍古谢维奇等著名作家。

1917 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1922 年成立了苏联，后来逐步发展为包括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的大国。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摩尔多瓦)、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加盟共和国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苏联从早期就注意文化的普及工作，主要是面向工农大众，大规模的扫除文盲和长期坚持普及国民教育，完善从初级到高级的教育体系，培养出大批人才。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科学研究，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实践，在科学技术领域得到飞速的发展。到五十年代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苏联已在宇航事业中站在世界前列。社会科学也在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有了进展，主要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原则研究各学科的理论问题和从事社会实践，创建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文学艺术在体裁和题材上有广泛的开拓，注意描绘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物，注意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尤其是宣传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而使之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苏联文学以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旋律，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家，如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阿·托尔斯泰、萧洛霍夫、特瓦尔多夫斯基等，他们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旗帜，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把苏联文学推向前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文学发挥了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创造了许许多多反映反法西斯战争的杰作。战后几十年来的发展，文学走向多样化，出现了再度繁荣的景象，有了一批具有全苏联意义的包括各民族在内的作家，如冈察尔、艾特马托夫、邦达列夫、贝科夫、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梅列拉伊蒂斯等。

建筑、雕塑、绘画、戏剧、音乐、电影等艺术部门的进展也是成果丰硕。有一批闻名国际的专门家。戏剧和电影流传最广，影响也大，如戏剧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涅米罗维奇一丹琴科、梅耶霍尔德，都是属于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同时也是戏剧理论家。电影导演中则有爱森斯坦、普多夫金、杜甫仁科等最为突出，丘赫莱依和邦达尔丘克的成就也很大，后者还是杰出的演员。音乐界有不少传世的作品，其

名家有普罗科菲耶夫、沙波林、哈恰图良、肖斯塔科维奇等。芭蕾舞在沙俄时代就很有基础，到了苏联时代更是成为有独具特色的俄罗斯芭蕾舞，并且得以经常在外国舞台上演出，广为传播。苏联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普莉谢茨卡娅、马克西莫娃长期来一直驰名世界。

当然，苏联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时，在对待旧时代文化的态度上，掌握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和分寸，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同样，对待俄罗斯文化与别的民族文化的关系上也是如此。

然而，总的看来，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有突出的成就，引起世界瞩目，并受到许多国家的学习和仿效。

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的规律与特点

中国与俄苏的文化交流，有文字记载以来，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回顾过去，可以发现其规律与特点：

（一）文化交流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文化交流是由于双方各自社会发展的需要，为进行外事交往而开展起来的。中俄虽然并不自古接壤，早在十七世纪初叶便有外事接触，但真正互派使臣、签约通商，进而交流文化并建立正式的文化交流渠道，则是在俄国彼得大帝和清朝康熙皇帝当政年间，在 1689 年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也就是在十七世纪末叶。后来，俄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苏联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两次出现译介中国文化的热潮，无一不是受到当时社会发展和国际交往形势的积极影响。同样，中国在二十世纪初叶和五十年代大力译介俄苏文化、引进先进的社会思潮，也是由辛亥革命和新中国成立这两次大的社会变革所促进的。

文化交流又是国际交往的先导。中俄互表交际意向的文书早在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和清顺治十二年（1655 年）就到了对方的

首都，但因为都看不懂对方的文字，结果搁置了近一个世纪。清雍正五年(1727年)《恰克图条约》之后，在北京分别设立俄罗斯馆和俄罗斯文馆。前者为接受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和留学生来华学汉、满文；后者为清廷派八旗子弟入馆学俄文。经过互相学通对方的文字，初步了解对方的国情，才激发了交往的热情。

俄国从十八世纪兴起的“中国热”就是以文化交流为开端的。宫廷内外热衷于了解中国的古代文化和文物，直至向往这个地大物博、古老而文明的国家。诗人普希金由景仰‘中国贤人孔夫子”,到渴望去“万里长城脚下’实地考察,就是突出的事例,极富代表性。由此,又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文字准备和思想酝酿，才使两国的交往于十九世纪形成规模。

文化交流反过来又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中国由文字之交开始，进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了“五四”运动以及一系列的变革。这一切社会进步的取得都含有文化交流的功绩。

可见，文化交流和社会发展两者之间的确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促进的。而且文化交流对双方社会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二）双方在研究对方文化中已形成各自的传统和特点

从俄苏方面看：

1. 俄苏的中国文化研究历时久而且持续不断。俄国从十八世纪下半叶由汉、满文直接翻译中国哲学、历史典籍算起，也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如加上此前由法文转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则时间更长。长时间内翻译和研究一直坚持不懈，其间还出现过几次热潮。

2. 俄苏的中国文化研究范围广、成果多。从经典书籍到民间文化,从考古文物到历代工艺品,从儒、释、道学到宗教信仰,从宏观上的国家历史、皇朝更替、典章制度到微观上的细小工艺的考察，直至服饰特点、陶瓷器和古钱币年代的鉴定等等，都有人研究，而且写成专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3. 俄苏的中国文化研究已形成自己的传统方法。汉学人才虽然也有不少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但在学术界已养成一种风气，似乎不向学者型的方向发展，就不足以成就知名的汉学家。因而凡是想要多少做出点贡献的人，都极为重视搜集资料，力求多而全；坚持长期研究，务求深而细。大家师承瓦西里耶夫院士和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直至形成学派。

从中国方面看：

1. 中国对俄国文化的译介起步较晚，但在数量上却后来居上。从二十世纪初叶开始介绍以来，“五四”运动前后对俄国革命思想和苏俄新文化的宣传介绍，二三十年代对苏联新文学和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引进，四十年代抗战文艺对苏联卫国战争中反法西斯文艺的借鉴，可以说热潮不断，后浪追赶前浪。1949 年以后，翻译苏联文学和引进文化艺术的数量激增。单就文学作品的翻译看，从 1949 年到 1985 年已译成中文的，以作家人数统计，已超过五千人，包括俄国和苏联作家，如果不计其中的几百名俄国作家，那么苏联作家中已有近一半人的作品被翻译过来了（苏联作协会员 1986 年的统计是九千五百八十四人）。

2. 中国对俄苏文化成果注意吸收，重在“拿来主义”，甚至是搬用。无论是社会思潮、政治思想、文学作品，还是文化艺术的各种样式，诸如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电影，包括这些艺术形式的教育体系、教育制度和培养人才的方法，无不加以搬用和吸收。因而从效果上看，俄苏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就很明显。当然，其中也免不了机械照搬，失之偏颇。不过，后来依照“外为中用”的原则，经过分析、消化和吸收，形成本民族的艺术。例如从借鉴俄国的芭蕾舞而培养中国的芭蕾舞，以达到增加新的艺术种类、丰富中国的文化。

由此两相比较，中国的俄苏学比俄国的汉学更侧重于实践性。

3. 中国对俄苏文化的研究一向是人员多、队伍大。由于中国的

俄苏学具有明显的实践性，甚至非本学科和不掌握俄文的人，也都能参与介绍宣传俄苏文化的工作，因而使得队伍更加庞大。有时候专业研究人员和实际从事推广工作的人不分，专门研究的论著和进行普及宣传的读物并存。而在俄国，汉学实际上只是在一定的学者圈内的科学研究工作，不具有群众性，这就造成了由少数专家在汉学领域内非常突出、非常明显的局面。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成绩辉煌。无论在古代,还是在近代,都曾给俄罗斯思想界以启迪，被他们看作一种理想的文明，令大文豪托尔斯泰叹为观止。但在现代，其对俄国的影响就远不如俄苏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近百年来，中国从俄苏文化吸取了大量的精华，中国学者几代人也有过‘以俄为师’的经历。在当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中华文化自身也在更新和再创造，并连同中华古代文明再度引起包括俄国在内的世界的关注。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原来苏联地区各独立国家都开始了各自的汉学研究和进行汉学学科的建设。中国对苏联地区各国的研究也越出原有的框架，开始就各个国家分别进行单独的研究。今后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也会形成新的局面。

有关双方文化交流的论著

俄国和苏联学者的论述，见于汉学家的若干散篇文章，著名的如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论文集《东方学》（1982年）、康拉德院士的《康拉德选集·中国学》（1977年）、费德林通讯院士的《费德林选集》两卷集(1987年）等书中所收的有关文章。较集中的论述有三种书：(1)戈雷金娜、李谢维奇合写《过去五十年的苏联中国学》（1968年），属于断代史略性质，所写时期为1917—1967年，侧重在文学。(2)李福清《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小说·戏曲)》(1988年),涉及面在古

典文学的两种形式。(3)斯卡奇科夫《俄国汉学史纲要》(1977 年)及其配套资料索引《中国书目》(1960 年），最为全面和系统。

《俄国汉学史纲要》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和远东研究所通力合作出版的。东方学所的作者斯卡奇科夫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写出初稿，未及完成即于 1964 年去世，乃由远东研究所的米亚斯尼科夫通讯院士加以整理,至 1975 年完成。该书资料翔实，史料的选择、安排恰当，分析和归纳也有根据，颇具权威性。详细叙写三百多年来俄国汉学的发展史，从沙俄与清代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及经贸往来起一直写到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为代表的二十世纪前期。

从文学、文化或历史学的角度涉及交流史的，主要有施奈德专著《俄国古典文学在中国》(1978 年),沃斯克列辛斯基(华克生)的文章《苏联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1981 年),贾丕才专著《苏中关系》(1958 年),茨维特科专著《苏中文化关系》(1974 年)等。

中国学者的论述，最早有清代何秋涛的《朔方备乘》(1858 年)，其中若干卷册，对中俄两国交往的某些文书、史籍作了考证，或注释，或订正，便于后人了解史实的真伪，以及正确的理解，包括有对图理琛《异域录》的考证。后人所作的论述较重于文学和文化,而且写单向的关系者居多,《曹靖华译著文集》(十一卷,1989 年)中的若干序跋和文章、叶水夫的文章《苏联文学与中国》(1991 年),戈宝权等人分别写的以‘苏联文学在中国’或‘某位俄、苏作家在中国’为题的文章则有一大批。鲁迅较早注意到中俄文化的关系，写了《祝中俄文字之交》(1932 年）等文，很有影响。专题叙写中俄文化交流史略的，当推戈宝权的文章《谈中俄文字之交》(1988 年）和论文集《中外文学因缘》(1991 年)为最集中。

戈宝权《谈中俄文字之交》一文近三万字，系统叙述了从十七世纪初至 1949 年的文化关系，是我国文献中首次涉及双向交流的文章。依时间顺序分成七个阶段：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叶、

“五四”运动以后、1921—1927 年、1932 年至抗日战争前，抗日战争时期至 1949 年。每一阶段都涉及双向的交流，有人员的来往、资料的交换、相互的影响等，虽然仅为粗略的记叙，但已梳理出脉络，甚是可贵 。

侧重某一专题的论著，主要的有讲汉学方面的中国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编《俄苏中国学手册》上、下册(1986 年)，有讲文学和文化单向交流方面的李明滨著《中国文学在俄苏》(1990 年)和《中国文化在俄罗斯》(1993 年)，有讲文学单向影响的智量等著《俄国文学与中国》(1991 年)、查小燕著《北方吹来的风——俄罗斯苏联文学与中国》(1993 年)，有作比较文学研究的倪蕊琴主编、陈建华副主编《论中苏文学发展进程》(1991 年)等。

从历史学角度谈及交流史的当推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 4、5 册(1929 年)，史料极为丰富。另有历史著作如陈复光著《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1947 年)、何汉文著《中俄外交史》(1935 年)、彭明著《中苏友谊史》(1952 年)等。此外，有一些外国学者，也写过较有影响的论著，如法国学者加斯东·加恩著《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江载华、郑永泰译，1980 年)。

第一章　早期中俄文化交流

第一节　中俄文化交流缘起

中俄之间的交往可追溯到古代，起初只是通过丝绸之路，经过别的地区和国家为中介，有了间接的交流。后来才发展为直接的接触，尤其在中古时期。到了近代，俄国甚至出现过‘中国热”，彼此的交流蔚为大观。

一、陆上丝绸之路和蒙古西征时的接触

（一）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流

古代的‘丝绸之路”，自我国西北的渭水流域起，向西通过河西走廊，经过今新疆境内塔里木河北面的通道，在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以西越过葱岭，再经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在塔吉克斯坦境内）和康居国南部（今撒马尔罕附近，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西行。另一条路线由塔里木河南面的通道，在莎车（今新疆莎车县）以西越过葱岭，经大月氏（今阿姆河上中游一带，部分地带在土库曼斯坦境内）西行。两条路线会于木鹿城（今土库曼斯坦境内马里），再向西到达里海的东南边，

又向西延伸，直抵地中海东岸。

这条陆上丝绸之路的中间一段，恰好横贯苏联原辖地区的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等加盟共和国。西行的路线中，有一支还穿过里海以西地带，来到亚美尼亚。

大约自公元前二世纪以后，千余年间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过这条路线源源不断地运抵这些地区，同时经由这条主干线向周围地域辐射，其所起的文化交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地区，自汉朝通西域，即汉武帝于建元三年（前 138 年）派张骞出使西域以后，历代关于中西交往的事实，我国的文史古籍中都有记载。史籍所载中国通西域，与大宛、康居、大月氏的交流，资料相当丰富，不但有丝绸织品、日常生活用具、农作物等物品的交流，而且有居民迁徙、宗教教徒的朝拜、进香等人员来往，更有军事上的征战。这就是说，我国与中亚地区早就有直接的来往。当然，这时还不是同俄罗斯的直接接触。

所谓‘中亚’，即中亚细亚。在葱岭以西部分，史称为‘西部土耳其斯坦’；综观中国历代史上之《西域传》，其在葱岭以西，今西部土耳其斯坦境内者，阿姆河以南，可以大夏为中心。阿姆河以北，可以康居为中心。其余皆附属而已。唐以后，康国虽亡，而萨马儿罕（今译撒马尔罕）则依然为葱岭以西之政治中心。虽至近代，犹为俄领土耳其斯坦总督之驻在地也。’① 同样，‘亚美尼亚人之知有中国，为期甚早。西历四百四十年后（440 年，南北朝时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亚美尼亚史家摩西之《史记》著成。其书中记中国事情一节，颇为兴味也。’② 在摩西《史记》中记载有中国人移居亚美尼亚，以及亚美尼亚与中国历史上几个朝代（尤其元朝）政治上的交往等。③

①②③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 5 册，第 1、3 页；第 4 册，第 1、3—27 页，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1929 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